

中国农民工 市民化进程研究

刘传江 徐建玲 等著

“民工潮”、“民工荒”与农民工市民化

土地流转与农民工农村退出

土地征用与农民工农村退出

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与农民工城市进入

劳动力市场与农民工城市进入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城市进入

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城市融合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度量：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

ZHONGGUO NONGMINGONG
SHIMINHUA JINCHENG YANJIU

中国农民工 市民化进程研究

| 刘传江 徐建玲 等著

人民出版社

策划编辑:陈 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刘传江 徐建玲 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

ISBN 978-7-01-006786-5

I. 中… II. ①刘…②徐… III. 农民-城市化-研究-中国
IV. D42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1952 号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

ZHONGGUO NONGMINGONG SHIMINHUA JINCHENG YANJIU

刘传江 徐建玲 等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75

字数:302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6786-5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前 言

较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劳动力转移）是二元结构背景下发展中经济普遍存在的规律，也是二元经济走向一元化现代经济的必经之路。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在长期实行城乡壁垒政策后中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改革开放在加快了城乡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扩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大规模、不稳定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镇，特别是大都市和发达地区城镇的“民工潮”现象。这股规模空前、举世无双，而且流动方向与流动时间均非常集中的“民工潮”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文献检索显示，我国学术界对“民工潮”的背景、成因、现状、有序流动途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等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但已有研究较多注重经济动因、经济后果的研究，而对于低稳定性的乡城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如乡城流动人口社会整合、经济社会互动等问题，关注重视不够，对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乡城流动人口出现的新问题乃至农民工群体的根本出路的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显得比较欠缺。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十年前出现的“民工潮”，还是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都只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乡城人口（劳动力）流动的特殊表现形态，只有从深层次上并站在乡城流入人口（农民工群体）的层面来探讨上述现象，方有可能真正洞察到问题的本质和找到问题的出路。

众所周知，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导向改革放松了计划经济时代严格的乡城人口流动的规制，但在特殊的制度遗产和渐进性的改革模式下出现的城乡人口转移现象不是从农民（村民）到市民（工人）的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同步、合一、彻底的改变，而是呈现出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迥然不同的“中国路径”——农村人口的城市化

过程被分割成两个子过程：第一阶段，从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已无障碍；第二阶段，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目前的进展依然步履维艰，这正是亟须关注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因为从农民到城市农民工的流动过程已经没有实质性的障碍，才有可能出现“民工潮”；同时，也正是因为从进城农民工到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转变过程步履维艰，“民工潮”才会随着农民工的季节性流动而周期性地“潮涨潮落”。换言之，尽管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城乡“壁垒”已被打破，但已经从农民变成农民工的这一新兴群体仍然不能畅通无阻地穿越城乡之间有形和无形的“户籍墙”，未能完成城市化“中国路径”的第二段旅程，并因此而引发了由“民工潮”现象派生出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因此，中国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乡城人口转移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通过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来解决农民工的根本出路问题，而不是大多数学者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农村人口城市化”或“农民市民化”问题。

基于上述社会现实和认知，本课题组认为，对“中国‘民工潮’的问题、期间和对策”课题的研究，不宜再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和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宏观层面来分析和预测“民工潮”或乡城流动人口的背景、原因、态势和影响，而是要更多地从微观层面、立足于对农民工群体的特征和行为来考察、探讨农民工的出路问题。具体来说：（1）将“农民工市民化”作为本课题的研究主线。这是基于我国城乡人口转移“先从农民到农民工”，然后“再从农民工到市民”的“中国路径”，以及经典的教科书理论上的“一步转移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城乡人口转移的“中国路径”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因此需要用“农民非农化理论+农民工市民化理论”的“两步转移理论”取代传统的“农村人口城市化”或“农民市民化”的“一步转移理论”，而现实中缺乏的是系统的“农民工市民化”理论。（2）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需要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这三个环节着手。在农村退出环节，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耕地流转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农地征用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在城市进入环节，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户籍制度的转型、城乡一体化就业制度的变革、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积累、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投资与积累等问题；在城市融合

环节,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工生存保障的社会化和生存环境的市民化。现有的制度障碍是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最主要障碍,突破这一坚冰需要推进三大制度创新:构建农民退出农业、农村的新型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打造面向农民工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3)重点关注“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农民工,个体的人格特征显著不同,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和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农民工,不论在成长的社会环境还是家庭环境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两部分农民工不再是一个具有高度同质性的抽象群体,而是在文化、观念和行为上都有着明显差别的两个亚群体。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前沿挑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第二代农民工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这部分人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与其长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也迥然不同,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执著,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而且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

三年多来,本课题组基于上述基本观点和思路,综合运用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新制度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的分析视野,采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等方法,运用计量分析、统计分析和计算机数据处理手段,从理论、实证、体制(制度)和政策等层面探讨了农民工的市民化及其进程测度问题。本书正是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具体而言:本书首先以中国世纪交替时期先后出现的“民工潮”和“民工荒”现象为现实背景,从时间和空间维度角度提出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特色乡城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进程中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农民→农民工;第二阶段:农民工→市民)。而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包括农民工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三个环节。接着按照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三个环节展开:第二、三章研究农民工从农村退出问题,包括土地流转、土地征用与农民工农村退出;第四、五、六章是研究农民工的城市进入问题,

主要包括农民工城市进入的外部制度（户籍制度与就业制度）、劳动力市场、个人因素（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城市进入；第七章是研究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主要探讨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城市融合。最后，第八章是从总体上探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测度的内涵、指标体系以及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实证分析。

本课题研究成果的新意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1）首次提出解释中国乡城劳动力转移“中国路径”两步转移理论，即：“农民非农化理论+农民工市民化理论”。我们认为中国乡城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与市场经济国家迥然不同的“中国路径”：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过程被分割成两个子过程：第一阶段，从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已无障碍；第二阶段，即是从农民工到市民的农民工市民化阶段，面临着比“显性户籍墙”更加坚韧和难以穿越的“隐性户籍墙”。需要用“农民非农化理论+农民工市民化理论”的“两步转移理论”取代西方传统的“农村人口城市化”或“农民市民化”的“一步转移理论”。（2）首次系统地提出并深入研究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多层次内涵及其内在关系和农民工市民化的三大环节。笔者首次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包括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以及意识行为四个层面向市民的转化）以及具体环节（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三个环节），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各个环节。（3）系统地探讨了农民工群体的分化现象，并深入探讨了第二代农民工的新特征和第二代市民化面临的挑战。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代农民工是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最迫切也是最主要的部分。（4）第一次提出了测度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测量指标体系，并利用本课题组组织的针对流出地和流入地农民工所进行的两次问卷抽样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数据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实际度量中，我们强调主观意愿与能力两项关键要素，首次提出了外部制度因素、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个体市民化进程三层指标，并进行了实证分析。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2002~2003年度重大项目《中国“民工潮”的问题、前景和对策研究》（批准号：02JAZJD790023）的最终研究成果，同时也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新世纪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民发展研究》(批准号: NCET-04-0672) 的研究成果。项目负责人刘传江主持参与了课题研究的全过程, 承担了课题研究方案设计、调查方案设计、实地调查组织、文献研究、理论研讨、最终成果框架设计、部分章节撰稿和全部最终成果的修改、统编、定稿工作。课题组主要成员以不同方式参与了本课题的研究方案、最终成果框架和有关理论问题的研讨工作, 在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对本课题的研究工作作出了诸多积极的贡献。课题组成员徐建玲、周玲、黄云平、李桂芝、罗晶、赵莉娜等主要承担了本课题的实地调查、资料收集、数据处理和部分章节初稿的撰稿工作, 其中徐建玲还协助课题主持人完成了最终研究成果的修改、统编、定稿工作。撰稿人的撰稿分工是: 刘传江(第一、五、六、八章, 附录1、附录2), 徐建玲(第五、八章, 附录3), 罗晶(第二章), 李桂芝(第三章), 黄云平(第四章), 周玲(第六章), 赵莉娜(第七章)。由于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课题, 同时更主要是受水平和时间的限制, 本书中很可能存在不妥乃至错误之处, 恳请专家和同仁们批评指正。

刘传江

2007 年 10 月

于武昌珞珈山麓

目 录

第一章 “民工潮”、“民工荒”与农民工市民化	1
一、渐进性改革引发了“民工潮”和“民工荒”	1
二、农民工群体及其社会经济特征	7
三、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与进程	27
第二章 土地流转与农民工农村退出	36
一、土地流转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36
二、土地流转促进农民工农村退出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43
三、土地流转的方向及模式	54
第三章 土地征用与农民工农村退出	63
一、土地征用及其补偿	63
二、土地征用浪潮与失地农民现象	66
三、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保障失地农民权益	81
第四章 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与农民工城市进入	97
一、农民工城市进入要求推进相关制度创新	97
二、户籍制度与农民工城市进入	100
三、就业制度与农民工城市进入	110
第五章 劳动力市场与农民工城市进入	126
一、农民工就业劣势性及其局限性	126

二、农民工就业市场的经济学分析	131
三、第三方力量介入对农民工城市进入的影响	152
四、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对策	172
第六章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城市进入	174
一、人力资本与农民工城市进入	174
二、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城市进入	185
第七章 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城市融合	209
一、社会保障的建立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合	209
二、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分析	216
三、农民工社会保障滞后的原因和面临的障碍	228
四、构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合	232
第八章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度量: 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	244
一、农民工市民化及其度量的内涵	244
二、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实证考察	248
三、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测度指标构建及其度量	258
附录 1: 农民工就业问题研究调查问卷	268
附录 2: 武汉市进城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问卷	274
附录 3: 进城农民工基本状况的调查报告	283
参考文献	298

第一章 “民工潮”、“民工荒”与 农民工市民化

一、渐进性改革引发了 “民工潮”和“民工荒”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始的重工业优先、快速发展战略及其制度安排给中国的乡城人口流动和迁移构筑起了森严的城乡壁垒，几乎强制性地封堵了人们自发性的乡城人口流动。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后，自发性的乡城人口流动才重新成为可能。然而，在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势差”非常显著的情况下，以农村为突破口、从传统体制外围改革为特色的渐进性改革，先后引发了广为关注的“民工潮”和“民工荒”现象。

（一）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民工潮”

1. “民工潮”现象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大军开始在中华大地上涌动，而且其规模与年俱增。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流动人口，1982 年不超过 3000 万人^①，1985 年上升到 5000 万人，1988 年为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编：《中国人口年鉴 1987 年》，经济管理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65 页。

7700 万人,这其中外出打工的农民及其他农村人口约占 70%。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全国民工及他们所带动的农村流动人口,在 5000 万人以上。^① 1992 年全国约有 6000 万~7000 万农民工在流动。^② 根据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对 11 个省的 75 个村的跟踪调查,1993 年 75 个村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 15%,据此分析,全国农村劳动力总数为 4.3 亿,外出劳动力大约为 6450 万人,这与有关部门测算的 7000 万人大体相近。^③ 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测算,1995 年离开本乡外出务工农村人口在 6500 万~7500 万人,1995 年达到 8000 万^④,占流动总人口的 81%~94%。^⑤ 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 1.2 亿,其中进入城镇在二、三产业单位打工离土离乡的农民工约 8000 万人。据有关部门统计,2002 年离土离乡的农民工约为 9460 万,在人数上已经超过城镇有户籍的二、三产业职工。^⑥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实施的农村住户劳动力抽样调查,调查样本农户中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由 1997 年的 18.1% 上升至 2000 年的 23.6%。根据统计调查推算,2002 年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超过 9400 万人,比上年增加约 470 万人。全年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就业的人数比上年增长 5.24%。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查分析,2005 年 5 月,我国外出农民工总数约为 1.2 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约为 1 亿,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约为 6000 万(按照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 80% 进入城镇、50% 跨省流动计算)^⑦,如果再

① 王洪春:《中国“民工潮”与经济发展》,载《社会学研究》,1997 年第 4 期。

② 潘盛洲:《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载《管理世界》,1994 年第 3 期。

③ 郭书田:《“民工潮”——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分析》,载《科技导报》,1995 年第 4 期。

④ 人民日报,1995 年 7 月 9 日,第 1 版转引自陈浩:《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发展》,载《人口研究》,1996 年第 7 期。

⑤ 王洪春:《中国“民工潮”与经济发展》,载《社会学研究》,1997 年第 4 期。

⑥ 许巧仙:《“民工潮”现象的经济学思考》,载《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6 期。

⑦ 劳动和社会保障调研组:《当前农民工流动就业数量、结构与特点》,出自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0 页。

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①。据有关专家预测,未来一段时期内,如果政策不发生大的变化,农民工的数量仍会以平均每年500万人左右的规模持续增加^②。尽管这些调查的口径和范围不尽相同,调查方法和结果也略有差异,但都反映了农村劳动力流动数量巨大,并逐年增加的事实。^③

2. “民工潮”产生的原因

有关“民工潮”产生的原因,或者说是社会经济背景,国内许多学者已经作了较多的研究和探讨,形成了以下主要的认识:(1)以蔡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相应体制是“民工潮”产生的深层原因。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均耕地的减少,一旦国家在政策上有所松动,近30年所积淀下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农村新蓄积了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便大规模转移出来了,形成了所谓的“民工潮”。^④在这一点上,许多学者看法一致。(2)不少学者从“推力—拉力”角度解释“民工潮”产生的原因。农村劳动力增长超出了刚性土地资源的有效容纳力,农业比较经济效益低以及乡村企业吸收农村劳动力能力减弱对农村劳动力产生了巨大的外推力;城乡居民收入差异日益扩大,城市经济活跃,就业机会较多,形成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形成了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内拉力;发达地区、尤其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产生巨大吸引力。据对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的调查:外流偏重客观或物质因素的占51.9%,偏重主观或精神因素的占42.2%。^⑤(3)辜胜阻等学者从社会经济背景分析,认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施、紧张的人地关系、粮食的增产、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等给农民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城镇的初

① 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中国农民工问题中报告》,出自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② 华迎放:《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载《新华文摘》,总第344期,2005年第20期。

③ 都阳、朴之水:《迁移与减贫——来自农户调查的经验证据》,载《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4期。

④ 蔡昉主编:《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1990~199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⑤ 陈浩:《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发展》,载《人口研究》,1996年第7期。

步开放吸引了农村人口流动,地区间发展差异加大了人口流动的势能。^①(4) 罗玉达认为“民工潮”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必然会出现的社会现象^②。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非农产业与城市化的不协调是我国城市化的主要特点^③。(5) 杨云彦认为投资倾斜是劳动力跨区流动的重要导向因素。资本投入向东部地区的倾斜,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并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大量流入东部地区。经实证分析,投资对劳动力流向有牵引效应,1985~1990年间各省区劳动力流入量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系数为0.7758,1990~1995年的相关程度为0.9454。^④(6) 刘正芳认为城市和农村的比较利益的差别是导致农民大量涌向城市打工的原因。^⑤(7) 段小梅认为寻求较高的收入水平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省内的流动以大中城市为主,远距离流动则主要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的收入水平都较高。^⑥(8) 谭文兵等认为农民就是从城乡收入之间的差额上选择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经济利益的机会和地点来进行迁移的。这种追求自身利益的迁移选择,是人口向城市化运动进程中强调微观动力机制的根本动因。^⑦(9) 蔡昉和都阳从绝对收入差距和相对收入差距角度分析发现,二者都对迁移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不应仅仅看到城乡绝对收入差距带来的迁移,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甚至大于城乡之间的差距,对迁移有着激励作用。^⑧(10) 徐维祥等认为产业集群所导致的农村跨省流动是大量农村

① 辜胜阻、刘传江主编:《人口流动与农村城镇化战略管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196页。

② 罗玉达:《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及其出路研究——兼论“民工潮”的对策》,载《贵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③ 邹农俭:《中外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的比较研究》,载《人口学刊》,2001年第5期。

④ 杨云彦:《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转移与区域政策》,载《人口研究》,1999年第9期。

⑤ 刘正芳:《民工潮:起源效应与对策》,载《财经科学》,2004年第4期。

⑥ 段小梅:《人口流动模型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载《农村经济》,2003年第3期。

⑦ 谭文兵、黄凌翔:《农村人口城市迁移的动力机制》,载《城市问题》,2002年第2期。

⑧ 蔡昉、都阳:《迁移的双重动因及其政策含义——检验相对贫困假说》,载《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4期。

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①，同时产业集群成长支撑着农村劳动力的稳定转移^②。

（二）近年来新近出现的“民工荒”

1. “民工荒”现象的出现

从2004年1月起，有着近9亿农民的中国首次遭遇了“民工荒”，打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在广东东莞首次官方确认民工紧缺以来，随后波及到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福建沿海地区、环渤海地区，并向中西部地区纵深发展，其中尤以珠三角地区为甚。仅深圳、东莞两市即缺农民工超过50万，据有关专家估计，广东省缺农民工超过200万。

长江三角洲地区以浙江宁波为例，据宁波各县（市）区就业管理部门对432家规模较大的企业开展的劳动力需求状况调查显示，这些企业的农民工人数缺口为2.9万，2004年的从业人员为22.95万人，用工缺口达12.6%。

环渤海湾地区以辽宁大连、山东烟台为例。据大连市外来劳动力市场的统计显示，2004年1~8月份，该市用工单位共提供岗位数约4.8万个，但劳动力市场只介绍了1.4万名农民工上岗，近3.4万个岗位处于空缺状态。据烟台市劳动力市场2004年第二季度职业供求状况分析显示：第二季度全市用人单位提供的各类需求岗位46830个，比2003年同比增加了6.7%，而进入市场报名、求职的人员总计只有40595人次。

中部地区以湖北武汉、湖南长沙为例。据业内人士估算，单只武汉正街缝纫工的缺口就在9000人左右，占总需求量的1/3。据湖南长沙妇联家政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2004年春节以来，该中心保姆市场求职的保姆数量大概减少了70%。

西部地区以新疆为例，新疆地方和生产建设兵团都普遍面临着往年

① 范剑勇、王立军、沈林洁：《产业集聚与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载《管理世界》，2004年第4期。

② 徐维祥、唐根年：《基于产业集群成长的浙江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实证研究》，载《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第6期。

少见的“民工荒”。新疆兵团2004年700多万亩棉花需要近40万名摘棉工。单农七师大概就需要10万余名外来工,缺口2万余人。据新疆石河子垦区农业局有关负责人透露,该地区2004年本计划从内地招收18万名季节性棉花采摘工,但实际上仅有10万人到位。“民工荒”在重庆、贵阳、兰州等不少西部城市均有不少的报道。^①

2. “民工荒”的原因

始于2004年,最先发生在东南沿海的“民工荒”是在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城乡收入差距悬殊条件下产生的,对此,学术界给予了不同原因的解釋:(1)“民工荒”是结构性短缺^②,也是技工荒^③。(2)“民工荒”出现的真正原因在于农民工的工资低,特别是没有伴随物价特别是粮食价格的上涨而导致净收入下降^④,是劳资关系冲突的症结^⑤。(3)政府的惠农政策减弱了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冲动。^⑥(4)通货膨胀使农民工产生适应性预期,由于预期通货膨胀率高于实际通货膨胀率,从而减少劳动供给导致短期内劳动力市场失衡。^⑦(5)对农民工不利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是“民工荒”的根源。^⑧(6)产业过度集中以及产业转移滞后引起区域性“民工荒”^⑨,是低级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城乡二元体制的“混血儿”^⑩。(7)“民工荒”体现出民工维权

① 此处仅列举几例媒体的报道:(1)新华网2005年5月16日以《“民工荒”现象呈西移之势》为题报道了重庆市农民工短缺的情况;(2)中新社2005年2月19日报道:《许多民工迟迟还未返城 兰州出现节后“民工荒”》;(3)《贵州都市报》2005年7月16日第一版以《省城二季度劳动力市场求大于供的形势有所缓解,普工需求缺口最大》为题报道了贵阳市农民工短缺的情况。

② 李传志:《关于珠三角“民工荒”的思考》,载《经济问题》,2005年第5期。

③ 王国辉、穆怀忠:《民工荒、技工短缺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临界点》,载《人口与经济》,2005年第4期。

④ 包小忠:《刘易斯模型与“民工荒”》,载《经济学家》,2005年第4期。

⑤ 黄晓静、张辉:《“民工荒”——中小企业劳资关系冲突的症结》,载《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5年第18期。

⑥ 王建红:《农民工短缺的理性分析与应对策略》,载《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7期。

⑦ 车圣保:《略论通货膨胀预期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载《价格月刊》,2005年第9期。

⑧ 马用浩、由彦平:《社会转型视野中的“民工荒”现象》,载《求实》,2005年第7期。

⑨ 刘艳:《“民工荒”现象探析:一个产业转移的视角》,载《探索》,2005年第2期。

⑩ 韦曙林、许经勇:《透过“民工荒”现象看其问题的本质》,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

“用脚投票”的市场行为选择^①和维权组织的缺失^②。(8)“民工荒”凸显出劳动力市场多层次矛盾^③，也是市场调节的必然^④。(9)从劳动力个人供给角度看，第二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的不同价值取向和工作要求，导致在次属市场上劳动力供给不足。^⑤此外，进城务工成本不断升高、工业扩张对农民工需求扩大、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的推进而出现了民工流向成多元化发展态势等因素，也是出现“民工荒”的现实原因。

二、农民工群体及其社会经济特征

“民工潮”的冲击波尚未消退，“民工荒”的喊声又不绝于耳。现有的人口流动理论中找不到对这种看似矛盾现象的有力的解释。所谓“民工潮”、“民工荒”，其全称是“农民工潮”和“农民工荒”，为了寻找上述现象的实证成因和出路，首先需要考察“农民工”这一现实的概念和群体的内涵与特征。

(一) 农民工的内涵和外延

1. 农民工称呼的演变

农民工一词经历了“盲流”、“民工”、“打工仔”、“打工妹”、“外来务工人员”、“新产业工人”等最终约定俗成下来。

(1)“盲流”。所谓“盲流”，根据字面意义来理解，原指盲目流动

① 卢巧玲：《从“民工荒”现象看农民市民化》，载《农村经济》，2005年第6期。

② 程蹊、陈全功：《“民工荒”与民工维权组织的建立》，载《农村经济》，2005年第2期。

③ 宋晶：《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基于劳动力市场管制视角的分析》，载《财经问题研究》，2005年第10期。

④ 卢巧玲：《从“民工荒”现象看农民市民化》，载《农村经济》，2005年第6期。

⑤ 刘传江、徐建玲：《“民工潮”与“民工荒”——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视角的经济学分析》，载《财经问题研究》，2006年第5期。